



想不到我的一篇小文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，竟建议我写写《石语》。

深蒙错爱，却不之恭，应命行文，又恐难副雅岩先生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一书，中有《石语》：深，文笔之利，极为爱读。但对其中所引资料，常不免行文枝蔓之故吧，其实不妨采用唐德刚写《胡读后的主要一点建议》。

寄庐茶座

刘衍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寄庐茶座/刘衍文著. —上海: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
2004. 11
ISBN 7-5432-1053-3

I. 寄… II. 刘… III. 文史-掌故-研究-中国
IV. K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5973 号

责任编辑 江更生
装帧设计 杨建勇
技术编辑 徐雅清

寄庐茶座

刘衍文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汉语大词典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75 字数 43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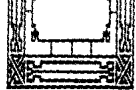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—3 100

ISBN 7-5432-1053-3/I·175

定价: 3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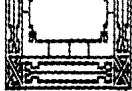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62662100 转



目 录

《石语》题外

- 小引 3
- 一、“依我”与“外我” 5
- 二、骈文与古文 11
- 【附说】 18
- 三、黄秋岳与梁众异 47
- 四、陈石遗与郑海藏 62
- 五、章太炎与黄季刚 108
- 六、陈石遗与冒鹤亭 156
- 七、陈石遗与黄海闻 176
- 八、林琴南与陈石遗 187
- 九、严几道与陈石遗 225
- 十、胡展堂的诗识与诗友 239
- 【附录】
- 勳勤乃展堂快婿 张增泰 268
- 关于蒋胡冲突及勳勤其人 袁冰如 269
- 十一、从汪兆铭说开去 271
- 【附录】
- 章、金“隙末”摭谈 袁冰如 309
- 【插话】
- 徐朗西家事琐话 312



【附记】

- 袁冰如先生来函摘录 340
十二、钱周之争平议 341

掌故谈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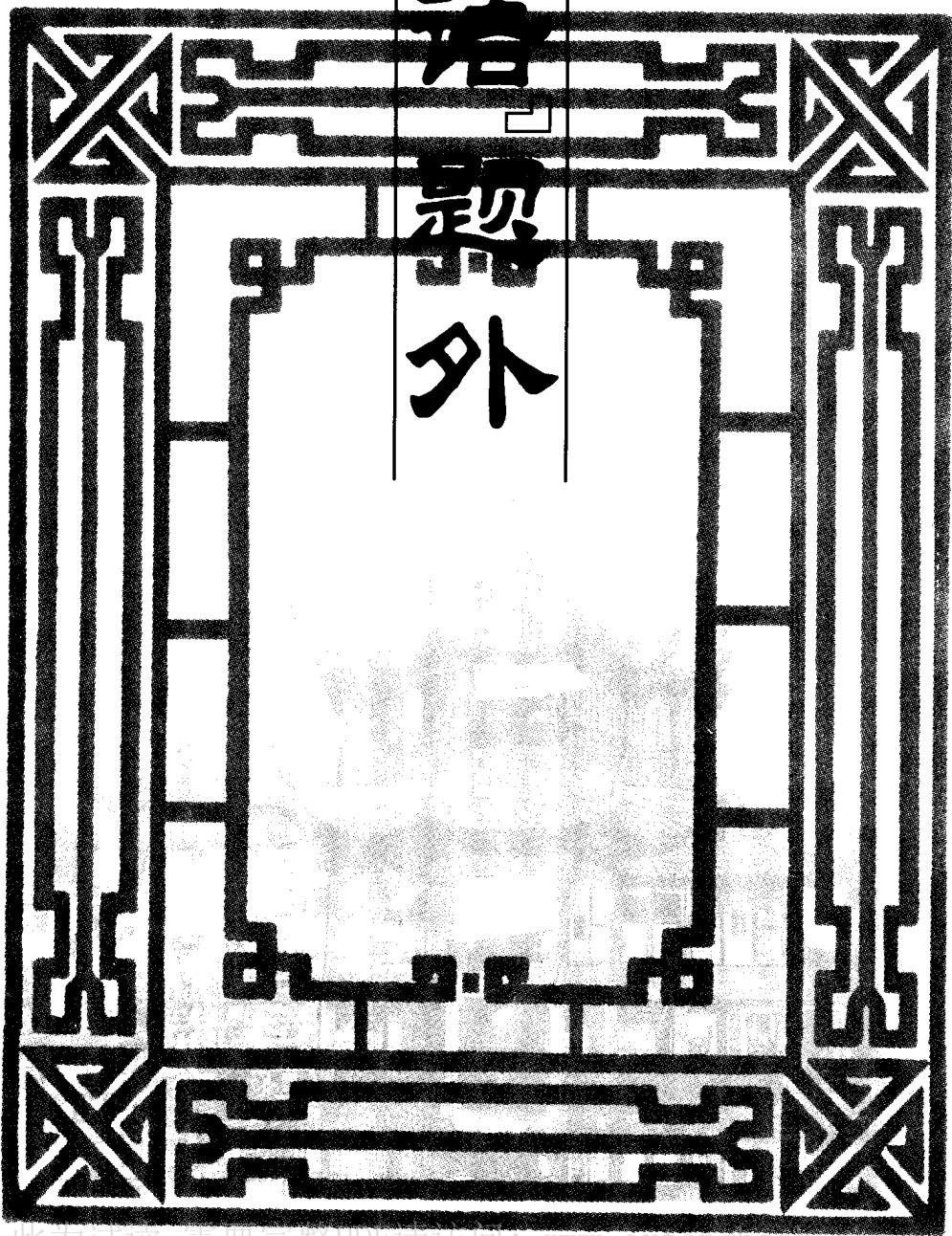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多棱镜里看纪昀 361
二、纪晓岚轶事辨讹 365
三、纪晓岚轶事辨讹小补 369
四、纪昀与和珅之间 372
五、乾隆为什么对和珅宠信不衰 375
六、三种不同的诙谐
——纪昀·刘墉·和珅 378
七、和珅拉杂谈 382
八、戏批《三国》三题 397
九、不读书、不识字与不学 414
十、古人的“自相矛盾” 420
十一、书影摭记 428

墨馀杂拌

- 一、重读《寒柯堂诗》小识 451
二、越公《与客谈诗漫成二十二绝》笺 463
三、瞎写旧体诗词要不得 491
四、不读全书可乎？ 500
五、要有一点古代文学常识 504
六、我不会忘记的乡贤们 509
七、老有所为谈往 521

后记 528

『石语』
题外



小 引

想不到我的一篇小文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据安迪兄函告，香港的林行止先生，大约见拙作中提及钱锺书先生吧，竟建议我写写《石语》。

深蒙错爱，却之不恭，应命行文，又恐难副雅望。因有关此题大作，已闻有多人涉及，自惟寡陋，拜读甚少。前唯见李洪岩先生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一书，中有《石语：钱锺书与陈衍》一章，写得甚有风趣。即就其全书而论，也甚佩其用力之深，文笔之利，极为爱读。但对其中所引资料，常恨其语焉不详，大有陈后山“书当快意读易尽”之叹。或李先生为有意避免行文枝蔓之故吧，其实不妨采用唐德刚写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的方法，多加附注，岂不更能得屢读者之所欲乎？这是我拜读后的主要一点建议。

又最近得见刘梦芙先生《〈石语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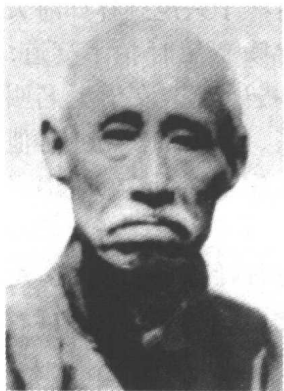
钱锺书与杨绛



评笺》(见《钱锺书研究集刊》第二辑), 徵引资料繁富, 亦深佩其用力之勤, 实值得一读。既有珠玉在前, 大有砒砒难继之感, 因为我绝不相信驽马之十驾, 真能等同骐骥之一跃。要把我这匹病弱残缺的老弩, 推出来与骐骥竞走, 怎能不疲于奔命, 露丑出乖? 由于有这一点自知之明, 虽出场而不敢拼搏, 却又不便缩回, 只好左顾右盼, 东倒西歪, 逸出旁斜, 不按规矩绕场一圈再说。观者不妨当做一个“馀兴”的笑料来调剂一下好了。故名其目曰“《石语》题外”。



一 “依我”与“外我”



陈衍（石遗）

据钱公《石语·序》，这原是“(民国)二十一年除夕，(陈石遗)丈招余度岁”，“退记所言”，后于“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”“重为理董”于“巴黎客寓”的一篇文章。查二十一年除夕，是为公历1933年1月25日，考陈丈(1856—1937)在这一年，已七十有七；而钱公(1910—1998)则尚只二十有三。这原是当夕一老一少所说的“私房话”，彼此说得相当坦诚和投机，不过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日子里，由于触及某些名流，自然不便公开，

这也就是《石语》直搁至1996年才行问世的原因。

不知读者注意到钱公手稿影印“陈衍石遗说”这五个字中“衍”字阙笔写作“衍”的情况否？直到1985年10月29日我蒙钱公损书，因贱名亦有“衍”字，钱公也是这么写的（附见原书复印件），近见《钱锺书手稿集·容安馆日札》中“衍”字也莫不如此。由此可见钱公对石遗先生的尊敬和尊重。按古时对帝王之名要避讳，各朝各代，都有特殊的规定，这里不须多赘。后代尊孔，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取士，对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之名讳，自雍正四年后，则又有统一的准则：凡有孔丘之“丘”字，一律避讳作“邱”，《论语》中孔子自称，则阙笔作“丘”；《孟子》中孟轲之“轲”或阙最后一笔或不阙，都同样读作“某”，塾师在命学生背诵时进行圈点，都要用朱笔在其名上画上一个方框框。此外又





石语

陳衍石遺說

錢鍾書熟存記

余早歲與公為駢文不能工也然已足傷詩
古文之拙矣遂批去不為凡擅駢文者其法在
又皆不工全弟子黃叔岳駢文集序其法在
大段而散句不能成語是其則也文字所措必
座壁上作影映窗紙七十有年其法在
亦為好文文字雖可慮也其法在
為學總以根柢史否則道聽塗說東瀛西
抹必有野馬脚靴尾三日交好中遠如嚴茂

《石语》手稿

有所谓“家讳”，唐李贺因其父名晋肃，不应进士举，韩愈为他写了一篇著名的《讳辨》之文，但李还是没有听从，仍然不肯应举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回，写贾雨村听冷子兴说到林如海夫人名唤贾敏时拍手笑道：“是极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，他读书凡‘敏’字他皆念作‘密’字。写字遇着‘敏’字亦减一二笔，我心中每每疑惑。今听你说，是为此无疑矣。”这该是读者所熟知之事吧？

我略引这些掌故典籍，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观念形态和民族传统的道德习俗来看待，于此可

见钱公对石遗先生的心态，复乎与其他前辈不同，知遇之恩与知己之感，始终用尊师尊圣之礼侍之，该是多么的难得啊！人们每每对钱公有刻薄之苛讥，但于此实亦足见其有厚道可风的一面。有些人或者以为钱公似不致于这么守旧，而不知钱公于致师友之间的函件，一直都是遵守极其严格的传统格式来表达的，当然这也得因人而异，如彼此都用语体文来往的书信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

原来师友之间，常常也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很为不快的世态。王闿运（湘绮）尝言及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，一个是廖登廷（即廖平），“思外我以立名”；另一个是杨度，“思依我以立名”。廖“犹能自立”，杨“则随风转移”。这当是湘绮老人多年接触观察而得，

并不是真有前知的神通。杨度的诗文原很可观，但耐不得寂寞。后来虽为革命做了一些工作，然学术上实一无所成。季平先生因潜心伏案，故不断有新著杀青，然太好求新求异，不惜穿凿附会，也终于偏离了轨道（参见拙著《寄庐杂笔》中《谈今文学家的殿军廖季平大师》文）。

湘绮老人所说的这两位弟子实际上是两种类型，而都各有其典型的意义，且又各有所发展。

我尝闻见属杨度型的若干人，其中无独有偶，有两位都说他们的老师是近今独一无二的大师，而其中只有他这个弟子才是嫡传的衣钵，其他都不能算数。而他的弟子也自诩为一脉相承的法乳。幸得他们尚是“自说自话”而已，不然，学术界也要掀起一场争霸的大混战了。不过我肯

定可以断言，像这样的传承弟子，纵然得其绪馀，实已一代不如一代，没有多大出息的了。

也有一些弟子，明知他们的老师成就不大，可也不切实际地把他们捧得过高过大；见有人对其师略有微词，就要群起而攻之。这与其说是为了报师恩，倒还不如说是为了抬高自己。这种人可说是杨度型的异化。

行文先生著作席前與賢即函問整歎
其書博詞賦打躬若牛毛中單同麟角後
乃知家信自到都恨恨你身兩妻長首方
可以說詩淡雅此後三補魏去共論之貴一
矣頃奉
惠賜大著墨一披自喜言之有物即事明理尋
舌空手能宣曲一強微以在丹之解頤並嚴利
之析骨教化廣矣常及於茲非則愧汗無處
背昌黎不云子夏學也亦可以為愧也
此復何即叩
老弟
賢即叩此
小書敬上 楊維同謹
十月廿日


钱锺书致作者的信



我又尝闻见属廖季平型而又变本加厉的，有些人初则服膺师说，继则处处与师对着干，但其宅心并不是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，却是挖空心思取而代之而妄图成为“百世之师”。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依草附木之徒、盲从蛊惑之辈。其危言诡说，虽可耸动一时，流毒一代，但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了，矫枉已有人，自欺必自害。我早有预见在前，却想不到现报端倪之速也。

介乎“依我”与“外我”两者之间，随着世情风会之变化而急速变脸的，亦古已有之，最典型的例子，无如乾隆、嘉庆年间袁枚（随园）的某些弟子。当袁声气最盛时，很多人都争相攀附以列门墙为荣。有两个自称门生的人都命其诗集曰《推袁集》，又有人刻一“随园诗弟子”的闲章以自炫。及至袁卒后讥弹攻讦之声四起，于是某人又改刻“悔作随园诗弟子”的闲章以自表白。说来其时尚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压力，但有许多人就抵挡不住这一场舆论的小小风暴了。其间独有一个名叫孙韶的却敢于处处为之回护（参见陈文述《颐道堂文钞》卷三《孙莲水传》、阮元《擎经室三集》卷五《春雨楼诗序》、恽敬《大云山房文稿二集》卷四《孙九成墓志铭》，及本人与刘永翔合注之《袁枚〈续诗品〉详注》增补本）。

及至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，诬师卖友，不惜造谣揭发而用以开脱自己者，更比比皆是。反右斗争中，常见有些人，其本性也许并不恶劣，及至被打而戴上帽子后，就如黠豎子之诱人跌落粪缸，或为佞鬼之陷害师友。初时，其本人虽总是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可怜巴巴的，一旦拨乱反正、改正平反，又一跃而自诩为“五七战士”，趾高气扬起来。我尝和友人感叹说，不要以为右派都是受冤枉了的好人，其间良莠不齐，也有的是戴上帽子后才变坏，改正后学了乖，反而变得愈来愈乖巧也愈发坏透了的。至于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，则尤变本加厉，层见叠出的反反复复，更是罄竹难书的了。然而在陆健东著的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中，也见到不少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品格的优异人士，如陈寅恪先



生的助手黄萱女士牺牲世俗的享乐，始终不渝的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；而其中尤以和他学生刘节教授之间的师生情谊最足感人：1967年底挺身而出竟愿代先生上台挨斗！他们历劫不磨，可谓千古难得一见，真令我肃然起敬，毕生萦怀。这才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、道德的光焰。

再转说钱公，先生对于世俗人生的陋习，原是早就有所参透了的。《谈艺录》（增订本）曾有多处慨乎言之，乃至司空见惯：“夫面谀而背毁，生则谀而死则毁，未成名时谄谀以求奖借，已得名后诋毁以掩攀凭，人事之常，不足多怪。子才（袁枚字）声气标榜最盛，世态炎凉，遂尤著耳。”（见529—530页）

及经文革的洗礼，感触尤深。当长子永翔晋谒时问及为何不招收研究生时，公似徐悸特深，乃坦然慨言曰：“研究生不是利用我的，就是要害我的。”剖析同于湘绮，但易“外我”为“害我”，愤激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但这决不是在有意步趋，实残酷的现实情状有以启之、“于今为烈”的五浊未俗有以证之故耳。故永翔于返回逆旅后感触殊多，枕上吟成七绝六首，其三即云：“大道犹惊射羿弓，臬比无意煦春风。但将著述留天地，百世仍笼绛帐中。”即是对钱公所说的这层意思的实录和感想。

《石语》的最可贵最难得的所在，就是真实。特别对陈老先生来说，不像他应酬文字对某些达官贵人及相与师友那么吹捧，也不会像写《石遗室诗话》那么的循人之情。这里没有任何社会压力、策略权宜和世俗干扰。倘要说是知人论世吧，这该是最靠得住的真实情感，绝无矫揉造作和违心掩饰之可言的。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年轻世交后辈，原没有顾虑和设防的必要。

但真实的谈吐虽然是陈老的由衷之言，却不见得全是公正的不刊之论。钱公记录时不乏凑趣的插话，目的无非是存当日之真情，可绝不能认同甚或误会为钱公的识见。记录后的按语，主要在便于读者的考索，而非有意帮腔或暗藏异趣之迹。若论彼此立意之别，读钱公著作，多可悟得。最显著者，如误论严沧浪之意，



《谈艺录》(增订本)207页即有道及,未尝有所讳避回护。拙作《寄庐杂笔》442页中已加摘引,足徵钱公之于真谛一端,决不肯因循苟且,为“外我”立名,所谓“蠹生于木,而反食其皮”者实不可同日而语;至于“依我”呢,永翔在《读〈槐聚诗存〉》中曾记述苏渊雷教授在钱家见书房挂着陈老写给钱公的诗轴,当时未曾记下,后来去信求其录示,钱公复信不允说:“倘传录炫示,便迹近标榜借重,非某甲堂堂一个人所愿也。”(详见《钱锺书研究集刊》第一辑)

尊前辈,具深情,不“依我”又不“外我”,不矫情又不循情,看破世情而又痛贬恶俗。少陵诗云:文章有神交有道;定公诗云:独往人间竟独还。二语当可为钱公合而诵之矣。



二 骈文与古文

《石语》曰：

余早岁学为骈体文，不能工也，然已足伤诗古文之格矣，遂抛去不为。凡擅骈文者，其诗古文皆不工。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，而散文不能成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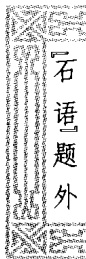
初读这些话，似觉石遗老人只是信口而出，并不曾作过周密的考虑。立论的中心，只在以骈文与古文对论，诗不过是好像顺口拖出来的。因为所举其弟子黄秋岳的例证，并没有涉及他的诗。反观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中，誉及其诗者却在在可见，都没有说其“不工”，倒是“极工”的呢！

那么，《石语》所记“诗古文”的“诗”，是否因口误而赘入理宜删去才对呢？

是又不然。检《石遗室诗话》卷八则又有说云：“习为骈体文者往往诗情不足。以在‘六艺’中‘赋’、‘比’多而‘兴’少，《颂》、《大雅》多而《风》、《小雅》少也。惟武进屠敬山（寄）工六朝骈文，而《结一宦诗》，则诗情亦复不浅。”则显然又是以骈文与诗对立而言的。照这样说，岂不是惟屠敬山诗是特例，黄秋岳却又不在于其列了吗？

但这毕竟是行文前后失应的小疵，提而勿论可也。见及此语，很容易使人想起明末清初侯方域（朝宗）的一则掌故来。

按周百安（圻）《与吴冠五书》云：“朝宗初学骈俪文，壮而悔之，规于大家。”查侯的《壮悔堂文集》卷三《与任王谷论文书》





有批评骈俪文的一段话说：

六朝选体之文，最不可恃。士虽多而将器，或进或止，不按部伍，譬如用兵者，调遣旗帜声援，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阵，遥相照应，未必全无益。至于摧锋陷敌，必更有牙队健儿，啣枚而前，若徒恃此，鲜有不败。今之为文，解此者鲜矣。

初初看去，似真有异代同心之感。但细按之，却全然有别，朝宗所指责的，是专指“六朝选体之文”，石遗老人所说，乃是指历代所有的骈体，即除选体外，尚包括初唐的王、杨、卢、骆，晚唐的“樊南四六”，以及两宋直至清末民初之作。朝宗指出选体文字的弊端，是确实存在的。即如最著名的足以代表骈俪典范的《哀江南赋》，其“序”与“赋”，就多有重出和凌乱的所在，即所谓“不按部伍”者是，而并非是技巧上的倒装与曲折。石遗老人非难骈文，虽与侯氏之说角度不同，却认为学了骈文，就“足伤诗古文之格”，难道骈文之为害，竟是这么沾染不得的吗？

倘从另一途径来探索，如李小湖的《好云楼初集》卷二十一《木鸡书屋骈文序》中即说：“雪苑（即方域）正短于骈体，故为是名，以尊其集耳。”这正如《伊索寓言》中所说的，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。事实上，才子型的文人、名士派的学者，常有把自己不能为的说成是不屑为，自己不曾得到的就说已经得到了的都算不得数。最显著的实例是龚自珍，因其生平不善书，以是不能入翰林而大恨。凡其女、其媳、其妾、其宠婢，悉令学馆阁书。客有言及其翰林者，必哂曰：“今日之翰林，犹足道耶？吾家奴人，无一不可入翰林者。”（详见柴萼《梵天庐丛录》卷十一。其他笔记亦各有相类记载）而最天真得幼稚可笑的则莫过于王闿运，其《湘绮楼日记》光绪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云：

看惠栋《汉书·注》：“今此谁贼。”文理不通，信元和生员之陋也。生员、翰林，本朝无通人，积习移之使然，亦犹进士官少能吏，彼拘墟之见重也。然则举人乃人才之藪，宜克（恣）斋、季高偏贵之。

由于湘绮老人自己不曾考取进士，只是一个举人（光绪三十四年，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请特与褒奖，才于四月初九日硃批赏给翰林院检讨，这绝不能算做科班出身），于是遂将举人之上（进士、翰林）下（生员）一齐抹倒，而唯此中阶“乃人才之藪”，且以吴大澂、左宗棠为例证之，岂不令人绝倒！

石遗是否也有这种心态呢？这是颇值得我们玩味的。其实石遗于己之诗原文是相当自负的，这里说“伤诗古文之格”，正是由于“早岁学为骈体文”之故，言下之意是说，倘使不学骈体文，成就还会更大，学而两伤，今已追悔莫及，徒唤奈何矣。要是真有人有所讥弹，则已解嘲在先，足以封嗤点流传之口，亦未为得计也。

姑不论石遗的想法究竟如何，且单提“凡擅骈文者，其诗古文皆不工”王用建这个立论，却是非常片面的，只不过是“自照隅隙”，专从一己的经验和极少数例证下此武断，即所谓“以偏概全”罢了。

须知以体论文，最早在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里，就有“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”的话，又接着说：“故能之者偏也。唯通才能备其体。”虽其时文体尚未大备，但曹丕的论断却已照顾

石
徑
流
泉
映
初
月

金
尊
綠
酒
生
微
波

侯
森
大
元
薛
世

石
語
題
外

王闳运（湘绮）手迹